

文章编号: 1673-0453(2008)01-0017-04

简述江苏基督教界的抗日活动

高俊

(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文教系, 江苏 扬州 225000)

摘要: 抗日战争时期,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, 在这民族危急关头, 全国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。江苏基督教界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, 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日作出了贡献: 开展抗日宣传, 激励教众放弃“和平主义”, 奋起抗争; 联系国际友人, 争取国际援助; 利用特殊的身份背景救助难民、救治抗日伤员; 抵制日式基督教的入侵。在抗日活动中, 江苏基督教界虽付出了很大代价, 但广大教徒面对强暴的侵略者不屈不挠, 坚持斗争, 最终和各界民众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春天。

关键词: 抗日; 江苏; 基督教

中图分类号: K264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1937年,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, 日军对所占区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实行严密控制。江苏基督教^①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也遭到很大破坏, 但教会中的许多人能站出来, 以各种方式抵抗日军的暴行。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, 同仇敌忾, 以各种形式支持抗日, 反抗日本侵略者: 或宣传号召, 或设难民收容所, 或组织救护医疗队, 或直接参与营救抗日士兵的活动。不管他们是外国籍的还是中国籍的, 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一、开展抗日宣传, 激励抗战

为激发广大教徒的抗日热情, 江苏基督教界的领袖和知名人物纷纷发表时事谈话, 支持抗日。中国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南京教徒说道: “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丧失了与其他民族共存共荣的诚意, 往往迷信武力, 强凌弱, 众暴寡, 为目的不择手段, 于天主教博爱人类共济的福音大相径庭。”针对当时在基督教徒中有一定市场的“和平主义”、“非暴力主义”, 于斌向教徒们指出仅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不够的, 还要有实际的行动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 教徒们应奋起抗战。“必须本着公教(即天主教)的超性

精神牺牲主义, 把爱国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行。”战争开始后, 于斌就高呼: “势急矣! 势迫矣!” 号召南京教区的教友将学校及宿舍的一部分让出来, 作收容伤残军人和难民之用。并要求教徒紧急购买药物、纱布和绷带, 还要求有知识的教徒向民众演说, 宣传防空防毒的战时常识^{[1]116-122}。他在1937年底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, 曾担任过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主席团主席、全国慰劳戡乱将士总会副团长, 亲赴独山前线慰问作战官兵。他向社会各界演讲“世界大战与思想”一题, 号召大家投入到反法西斯行列。基督教办的一些刊物也开展抗日宣传, 当时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、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及南京基督教的刊物上都发表《告全国基督教书》等文章, 号召基督教徒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^[2]。基督教界的抗日宣传极大地激励了江苏基督教徒的抗日情绪, 使他们不再局限于基督教所宣扬的狭隘的“和平主义”, 一些教徒直接走上抗日前线, 同时也增强了普通民众的抗战信心。

二、抗议日军兽行, 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

抗日战争初期, 许多留在江苏的外国传教士

收稿日期: 2007-11-27

作者简介: 高俊(1972-), 男, 江苏高邮人, 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助教, 历史学硕士,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。

① 本文基督教取广义的意思, 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等。

也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。他们目睹了日寇的残暴行径,向本国发回了许多反映日本侵略暴行的报道,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了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。特别是一些留守在南京的传教士,如贝德士(Miner Searle Bates)、福斯特(Ernest H. Forster)、米尔士(Wilson Plumer Mills)等,均向本国大使馆报告日军的兽行,以期引起本国政府的重视及国际社会的关注。这批留守在南京的传教士以信函、日记、电影胶片的形式记录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罪证,这些材料成为后世人们控诉日军残暴兽行的铁证。有的传教士在战后成为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证人,为法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不仅如此,当时一些传教士不停地写信给日本方面,强烈抗议他们的行为。贝德士给日本使馆写了8封信,列举了他亲眼目睹的发生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日军种种罪行,期望军队恢复纪律^{[3]6-15};史迈士(Lewis S. C. Smythe)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,给日本使馆写了69封信以抗议日军暴行^{[3]277}。传教士对日军兽行的抗议,使日军非常恼怒,时有殴打、威胁外籍传教士的事件发生,但这并没有阻止住他们抗议的呼声。

除了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向外披露日军兽行,江苏基督教界的人士亦有走出国门游说世界各国抗议日军暴行的。南京主教于斌1937年前往欧美多国访问。据1938年5月12日汉口《大公报》记载,他所到之处,“口讲笔述,激动欧美人士,主持正义,保障公理的义愤,一致赞助我国英勇之抗战。”因其有“受人重视之地位,其言论在欧美人士中,特别具有一种强大之感动力,因此所经之地,亲华的空气,随浓厚。”在对外宣传的同时,他还展开募捐活动。1939年2月19日(旧历元旦),在于斌主持下举行“救护车百辆运动大会”,由于主教的演讲,参加游行人数逾万余人,游行后,在四小时内即募得两万万余元美金^[4]。江苏基督教界的活动,增强了国际间对中国抗战实情的了解,为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。

三、救助难民

江苏基督教界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,为保护难民做了很大的贡献。日军占领南京前夕,一些外籍传教士和外国侨民在南京西北部开辟一片3.86平方公里的“安全区”,收容难民,并且建立

了名为“安全区国际委员会”的组织。该组织14名成员中有5名成员来自教会机构,或是教会医院、学校的人员。1938年,该委员会又补充了一批新委员,绝大部分也是教会人员。该组织中教会人员和其他成员一道,尽最大努力保护难民生命,为难民提供食物、物资以及提供医疗救助。他们在阻止日军暴行时,也会受到生命威胁。传教士威尔逊医生(William F. Wilson)在驱赶一个日本兵出安全区时,差点被枪杀^{[3]477}。除了教会人员的艰辛努力外,教会机构场所在安置难民时也起了很大作用。在南京陷落时,一些教会机构和教会学校都临时充当起难民收容所,许多教会建了难民收容所。在这些难民收容所里,收容的难民前后有两万人,约占安全区内难民收容人数的1/3^{[5]12}。这里的难民,虽然不能完全逃避日军的兽行,但相对而言,在一定范围、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军的暴行,保障了南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解决了难民生活上的困难。当日寇在南京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时候,使这里的大批难民,特别是许多妇女和儿童得以幸免于难。

抗战初期除了在南京的教会组织为民众提供一些避难所以外,江苏其他地方的教会组织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如南京沦陷后,江苏省政府迁设淮阴,日机随至。淮阴长老会办的仁慈医院为保护群众躲避日机轰炸,在屋顶涂上USA标志,并挂上“红十字”的旗子,每当防空警报拉响,医院的大门洞开,尽量容纳四周的难民入内避难^{[6]88}。1938~1941年间,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再加上连年干旱,苏北地区常闹灾荒,人民生活困苦。美国传教士从上海运来大米、面粉、衣服等,分配到各地教堂发放^[7]。1938年日军侵占南通,美籍传教士利用学校、医院残部及城内教堂和人员组织基督红十字会,得到上海教会国际红十字会的粮食、医药等支援,对在抗日中的南通人民进行人道主义的救助活动^[8]。总之,江苏基督教界在抗日期间救助了无数的难民,在最困难的岁月里,和日本侵略者作着艰难的抗争,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难民以生活的希望。

四、救治伤员、支持抗日

由于教会医院的医疗设备在当时相对而言比较先进,在抗战中教会医院及时救治了许多伤员,

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。如在淮阴的仁慈医院, 由于医护条件优越, 在抗战初期承担了救治大量伤员的重任。据 1938 年医护统计表明, 抢救抗日伤员创空前记录, 日达六百余人^{[6]93}。江苏地方上一些教会组织亦为救治伤员做出自己的贡献,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, 在句容的中华三育研究社的师生立即成立医疗救护队, 进行救护训练, 准备上前线抢救伤病员, 参加抗战^[9]。丹阳县的天主堂主动开放, 迎接 34 所后方医院入住, 教会有 20 余青年男女参加护理约两个多月^[10]。

除了救治伤员外, 在抗战中, 江苏一些地方的教会机构及教徒利用特殊身份作掩护支持抗日。1939 年 3 月 1 日, 淮阴被日军占领, 由于局势的突变, 尚有不少未及撤离的伤员及政府人员迅速隐匿身分, 伪装病号住进医院, 在医护人员的竭力掩护下, 未遭日寇加害^{[6]93}。苏北的高邮是抗日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拉锯的地方, 高邮天主堂神父和修女李忠等人, 经常积极掩护抗日游击队出没。江苏各地都有天主教教会自觉组织信徒, 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^[2]。还有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, 救护受伤游击队员。1944 年 8 月的一天, 隐蔽在江苏海门县城北一带的新四军游击队与日伪军遭遇, 展开了战斗, 指导员茅锡堂中弹负伤, 无法医治, 万分焦急。当时, 教会私立锡类中学(现海门县中学)校长袁神神父和广济医院(教会办的)院长蔡国梁医生以及自己的堂妹袁宝兰等教友冒着生命危险, 通过日伪警戒线, 把游击队指导员护送到广济医院进行手术。在袁神父和蔡院长的掩护和治疗下, 茅锡堂很快康复出院, 重返抗日前线^[11]。更有一些教徒直接走上抗日前线, 如在徐州铜山地区, 由于日本牧师的统治, 教会人员受压迫, 有些教会人员便直接参加抗日, 如区主任马瑞祥、区长张印潭(原石庄教会执事)^[12] 等人。

五、抵制日式基督教

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,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宗教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控制。他们在“东洋人掌着东洋人的宗教”号召下, 在上海成立了“华中基督教同盟”, 作为在华东地区扩张其日式基督教的基地。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, 更是全面驱逐英美教士。为把中国基督教控制在自己手中, 在日占领区, 日本以支持中国教会脱离英美霸

伴、实现自立为幌子, 封闭了所有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、医院、学校和企业机构, 并把英美侨民及传教士集中监管起来, 乘机扩展为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日本式基督教。

对于这种披着基督教外衣的侵略活动, 江苏基督教界人士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。江苏昆山陷落后, 日本先后派来牧师传道, 企图开展当地教务并为日军服务。当时的特务牧师富田凭日寇势力, 占用昆山一处地方设立礼拜堂, 四出拉拢, 但教徒憎恨日寇暴行, 几无一人前去做礼拜, 徒然空设而已^[13], 使得日方的计划受到挫折。江苏基督教人士除了对日本人所办的基督教采取消极、不响应的抵制方法外, 还采用教会自立的方法与之抗衡。1939 年, 日寇侵占泗阳, 全县教会工作几乎停顿。有若干教民代表发起在来安集北边贾庄召开全县教会代表会议, 邻县淮阴、沭阳也有代表参加, 会上决定成立“中华基督教淮泗沭自立会”, 实行教会自立。1941 年, 日本人为控制该地区的教会, 从徐州派牧师前来淮阴, 把泗阳划为“清淮分会”, 企图使教会为日本人服务, 但农村教会仍坚持由“自立会”来负责, 与“清淮分会”分庭抗礼, 拒绝为日本人所用。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^[14]。在抗战期间, 日本方面企图通过发展日式基督教为侵略服务的希望并未实现, 其宗教侵略政策和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一样, 最终遭到了失败的命运。

正如 1950 年周恩来总理说过的:“在抗日战争时期, 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。”^[15] 在抗日战争期间, 江苏的基督教界为抗战做了很多事情。在抗战前期, 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存在, 在一些为抗日服务的工作上, 尚有些便利条件可用。正如一份基督教会后来的报告所称:“当中日战事初启数年中, 教会事业, 得西工合力支持, 困难不多。”^[16] 尽管如此, 江苏的基督教机构很多毁于战火, 基督徒受迫害, 如 1937 年宿迁沦陷后, 日寇以“暗中组织‘信行救国十人团’”的罪名, 逮捕程鹏云牧师及林增仪、康迎宜两位长老, 历时七十天方始获释^[17]。太平洋战争以后, 情况变得更糟了, 江苏的教会教堂几乎全被日军占领, 正常的礼拜活动遭到破坏, 许多教堂被日军摧毁, 传教士被关、被杀。常仁在《江苏近代史上的基督教》一文里写到, 江阴教会的 23 幢房屋被日军烧毁 20 幢, 徐州王恒心牧师被捕入狱, 栖霞教堂的西教士被枪杀^[18]。但江苏的许多基督教

徒并没有被日寇的淫威所吓倒,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,仍然以各种形式与日寇抗争,充分表现了与敌斗争的顽强意志。江苏基督教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,成为全民抗日的的一个组成部分,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贡献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徐畅,牛淑萍.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[J].历史档案,2005(3):116-122.
- [2] 黄常伦.江苏宗教界在抗日战争中[J].江苏地方志,2002(2):40.
- [3] 章开沅编译.天理难容——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4] 佚名.于斌主教在欧美工作成绩[N].大公报(汉口),1939-03-08(6).
- [5] 朱成山.考证南京难民收容所[J].江苏地方志,2005(4):12.
- [6] 马牧英.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清江的活动[G]//淮阴文史资料(第4辑).淮阴:淮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,1990.
- [7] 李为华.灌云基督教会史简述[G]//灌云文史资料(第5辑).灌云:灌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,1991:15.
- [8]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南通市志[M].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0:2443.
- [9] 张垂裕.中华三育研究社的性质及简史[G]//句容文史资料(第2辑).句容:句容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,1984:88.
- [10] 许仲仁.丹阳天主教简史[G]//江苏文史资料(第86辑).南京: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,1995:585.
- [11]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,中国天主教教团.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育教材[M].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2:90.
- [12] 李庆先.铜山县基督教的过去和现在[G]//铜山文史资料(第3辑).铜山:铜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,1984:53.
- [13] 吴雅谷.基督教昆山浸会传教记略[G]//昆山文史(第3辑).昆山:昆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,1984:113.
- [14] 徐体龙.泗阳县基督教概况[G]//泗阳文史资料(第6辑).泗阳:泗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,1989:121.
- [15] 陈秀萍.沉浮录[M].上海:同济大学出版社,1989:120.
- [16]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.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[G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9:586.
- [17] 孙光宗.新沂县基督教会历史资料[G]//新沂文史资料(第2辑).新沂:新沂县文史资料委员会,1986:79.
- [18] 常仁.江苏近代史上的基督教[G]//江苏文史资料集粹(社会卷).南京:江苏文史资料编委会,1995:354.

On the Anti-Japanese Activities of Jiangsu Christianity Community

GAO Jun

(Culture Department, Yangzhou Higher Commercial College, Yangzhou Jiangsu 22500, China)

Abstract: During the Anti-Japanese war people of China were faced with life or death. In such a crisi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nt into the war in different ways. The Christianity community in Jiangsu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-Japanese War, carrying out Anti-Japanese publicity, urging followers to give up "pacifism", contacting foreign friends for support, saving refugees and wounded soldiers and resisting Japanese Christianity. In the Anti-Japanese activities Jiangsu Christianity sacrificed a lot but they kept struggling until the victory came.

Key words: Anti-Japanese; Jiangsu; Christianity

(责任编辑:喻世华)